

陶淵明「好讀書，不求甚解」析論

齊益壽*

摘要

陶淵明自稱「好讀書」，至於所好者何書，又從這些書中得到什麼心得，並且內化成其人格理想與價值追求？則至今仍未得到詳細的探討。他的重「會意」而輕「甚解」的讀書要訣，對於何謂「甚解」，過去率以漢儒溺於章句訓詁而不通大義要旨來解讀，雖無不當，但仍不夠充分。本文以為陶淵明所篤好者，經書之外，還有史書。至於子部、集部的書雖也多所涉獵，但尚不能與經史兩類相提并論。六經對陶淵明而言，是從不斷溫故知新中，內化成為人格理想與價值追求，培養出儒者的襟抱，奠定了「進德修業，將以及時」的人生方向。因此從而立之年起，陶淵明在仕途中奔走了十幾年，希望尋得知音，獲得重用，為「大濟蒼生」作出貢獻。然而知音難覓，時不可為，幾經猶豫之後，陶淵明終於辭官歸田，以躬耕固窮終其一生。對於史書，陶淵明不但遍讀當時所能尋獲的一切書面史籍，殷勤搜尋古老相傳而尚未形諸文字的口頭歷史，而且還編纂出可以被視為通史的綱目之作——《聖賢群輔錄》(原稱《四八目》)。從博覽史書中，陶淵明開拓出貫通古今的恢宏視野，淬鍊出思考判斷的獨立精神，因而能超越於晉宋名流的一時好尚。至於

* 作者曾為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兼系主任，目前為該系兼任教授，E-mail: ishou.chi@msa.hinet.net。

「甚解」，除了碎義逃難的章句訓詁之外，本文以為凡是孤立意象去比附史實的穿鑿附會，或是視數目統計的量化為客觀，或是拘執於字面符號而不能穿越表層深入意境者，也應該被視為「甚解」的其他類型。這些不同類型的「甚解」卻有共同交集，即見樹而不見林，重枝節而不顧體幹，好剖析而不善會通。重「會意」則恰恰相反。陶淵明從經史的深厚素養中提煉出重「會意」的讀書秘訣，而得到「欣然忘食」的喜悅，自然就「不求甚解」了。

關鍵詞：陶淵明、好讀書、甚解、會意、欣然忘食

一、前言

「好讀書」與「性嗜酒」是陶淵明平生兩大嗜好。如果一定要在兩者之中掂出輕重，分個先後，對陶淵明而言，他毋寧是將「好讀書」放在較為優先的地位的。在〈五柳先生傳〉中，陶淵明自述其平生嗜好，便是將「好讀書，不求甚解」置之於「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之前。然而作為讀者而言，歷代對陶淵明嗜酒所生的興趣，則遠超過對陶淵明所讀何書及其心得所在的好奇。是以有關陶淵明的酒品、酒趣、酒意、酒詩的論述，至今仍縣縣不絕；而關注陶淵明所好之書及心得收穫者，則寥寥可數。偶有論及者，又鮮能觀照全局，實事求是，而不免隨興所至，自由心證。至於陶淵明所謂的「甚解」，論者多以漢儒之溺於章句訓詁，未能探究本旨為說，然而此說究竟是「甚解」的唯一答案？抑是諸多「甚解」中的一種而已？從陶淵明讀書重在「會意」而言，則凡有礙於「會意」的種種解讀，豈非皆有成為「甚解」的可能，而不限溺於章句訓詁之一端？至於什麼才是「會意」？本文將試作說明，並略為舉例。最後則由陶淵明好讀之書的種類，及其重「會意」而「不求甚解」的讀書要訣，來省思對當今中文學界有何啟示。

二、好讀何書

與陶淵明有鄰里之誼一年之久(義熙十一、十二年間)的顏延之，在悼念陶淵明的〈陶徵士誄〉中，曾說誄主：「心好異書」。¹意指陶淵明所好者乃《山海經》、《穆天子傳》等這一類記載異聞異事的書。陶集有〈讀山海經〉詩十三首，第一首便說：「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可見顏延之稱陶淵明「心好異書」不為無據。然而「異書」在陶淵明好讀之書中所占的比重及其對陶淵明人格思想之形成所占的分量，是否能與其他典籍相提並論？顏延之僅提到「異書」而不及其他，能無偏頗？清沈

¹ 于光華編：《評注昭明文選》(臺北：學海出版社，1981年)，頁1081。

德潛《古詩源》卷三評陶淵明〈飲酒〉詩云：「晉人詩曠達者徵引老、莊，繁縟者徵引班、揚，而陶公專用《論語》。漢人以下，宋儒以前，可推聖門弟子者，淵明也。」²陶詩時常徵引《論語》是事實，如卷一的九首四言詩中便五度引用《論語》的典故：〈時運〉詩的「延目中流，悠想清沂，童冠齊業，閑詠以歸。」是引〈先進〉篇中曾點自述其志的典故；〈榮木〉詩「先師遺訓，余豈云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是引〈子罕〉篇孔子談後生可畏的典故；〈贈長沙公〉詩「進篋雖微，終焉爲山。」亦是引〈子罕〉篇孔子舉爲山之喻以勉人持之以恆的典故；〈勸農〉詩「沮溺結耦」既引〈微子〉篇「長沮、桀溺耦而耕」的典故，而「孔耽道德，樊須是鄙」又引〈子路〉篇樊遲請學稼學圃的典故，是一首詩中出現兩次《論語》的典故。然而陶詩雖好徵引《論語》，且《論語》中孔子的言行對陶淵明思想人格的形塑亦至關重要，但說「陶公專用《論語》」卻言過其實。朱自清從古直《陶靖節詩箋注定本》，統計其中的用典情形：「莊子最多，共四十九次；論語第二，共三十七次；列子第三，共二十一次……照本書所列，單是《莊子》便已比《論語》多；再算上《列子》，兩書共七十次，超過《論語》一倍有餘」，³因而認爲沈德潛所謂「陶公專用《論語》」是有問題的。朱氏雖有見於沈氏的言過其實，但他從陶詩所徵引的儒、道兩家典籍次數的多寡，以推證「陶詩裡主要思想實在還是道家」，⁴恐怕也是有問題的。一個人是否受到前人思想的影響，主要是看前人思想是否能內化爲其人格理想與價值追求，而非看徵引某家典籍次數之多寡。從所好之書能內化爲人格理想及價值追求，對陶淵明而言，最主要的應該是儒家的經書和歷代的史書。經、史之外，陶淵明雖也博涉子書和集部，但其重要性當不能與經、史相提並論。

² 清·沈德潛：《古詩源》（臺北：華正書局，1983年），頁207。

³ 朱自清：《陶詩的深度——評古直〈陶靖節詩箋定本〉》（層冰堂五種之三），《朱自清古典文學論文集》（臺北：源流出版社，1982年），頁568。

⁴ 同上注。

(一) 陶淵明與經書

對於儒家的經書，陶詩中屢屢發出由衷的愛慕。如〈飲酒〉詩其十六云：「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詩云：「閒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世情。」可見陶淵明在三十歲前尚未出仕的青少年歲月中，在這約占人生之半的過程中(陶淵明享年以六十三歲計)，經書才是他的「宿好」。經由長年的溫故知新，經書中的聖賢已內化為其人格理想；經書中的思想，已內化為其價值追求。因此他對魏晉以來的知識界好尚玄虛，不肯將經書內化為精神生命，不肯效法孔子席不暇暖、處處問津的積極救世情操，深表不滿。〈飲酒〉詩末首說道：「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便是這種不滿的表達。〈飲酒〉詩當為義熙末為婉拒朝廷徵召而作，古直曾指出第九首「實為却聘之作。《宋書》本傳云：『義熙末，徵著作佐郎，不就。』殆即詠此事也。」⁵ 其實不僅第九首為却聘之作，第十二、十五兩首亦有拒徵之意，齊益壽〈陶淵明〈飲酒〉詩三問〉中已有論述，⁶ 茲不贅。晉安帝義熙年號共十四年，義熙末當為義熙十三、十四年，這時陶淵明已入晚年，距離去世不過十年左右。晚年的陶淵明尚且為當時之人不親六經、不學孔子而憤慨，儒家經書對陶淵明影響之深由此可見。

陶淵明景仰孔子，篤好六經，其為儒家經典所內化的人格理想與價值追求，可用《周易·乾卦·文言》中的一句話來概括，那便是「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這句話本是解釋乾卦九四爻辭的，陶淵明卻情有獨鍾，一再加以引用。〈晉故征西將軍長史孟府君傳〉末的〈贊〉既說：「孔子稱進德修業，以及時也。」〈讀史述九章·屈賈〉又說：「進德脩業，將以及時。如彼稷契，孰不願之？」可見在「進德」、「脩業」皆已充實的基礎上，期待即時為人所識，為世所用，好為「大濟蒼生」作出貢獻，一如后稷棄及司徒契能為帝舜

⁵ 古直：《陶靖節詩箋》(臺北：廣文書局，1964年)，卷三，頁10。

⁶ 齊益壽：〈陶淵明〈飲酒〉詩三問〉，《魏晉南北朝文學與文化論文集》(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238-259。

所賞識重用，而功成業就，名垂千古，這不但是陶淵明心目中的孔子之襟抱，也是陶淵明自己從少年到不惑之前半生所努力的目標。然而陶淵明所處的時代環境畢竟不同於孔子，孔子雖處在「政由寧氏，祭則寡人」的時局，魯國君權旁落，三家專政，但內部尚未出現動亂。陶淵明仕宦期間，則接連有孫恩之亂；王恭起兵欲清君側；桓玄先攻殺荊州刺史殷仲堪及南蠻校尉楊佺期，後更攻入京師，却旋篡旋滅。在一波又一波的大動亂中，造成劉裕的崛起。劉裕為取代東晉，既興兵北伐以收時譽，又不斷誅除異己。陶淵明處此血腥殺戮的時局，是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時代。孔子雖因季桓子接受齊國餽贈女樂而三日不聽政，郊祭又不致膳俎於大夫，而辭去魯大司寇之職，以五十五歲之高齡周遊列國，繼續探尋治國、平天下的機遇，直到六十八歲因所遇不果返魯，周遊天下達十四年之久。陶淵明則於入仕十餘年後的四十一歲便看清對現實已無能為力，不得不辭去彭澤令，以躬耕固窮終其一生。雖然陶淵明胸懷曠達，得失兩忘，「不以躬耕為恥，不以無財為病」，⁷但晚年所作的〈雜詩〉中，遇有難眠之夜，仍不能不為「進德脩業，將以及時」的壯志未酬，而感到悲悽不寧。〈雜詩〉第二首便是這一層心境的表述：「氣變悟時易，不眠知夕永。欲言無予知，揮杯勸孤影。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淒，終曉不能靜。」由此可見儒家經書所建構的價值理想，對陶淵明內化之深。

《周易·乾卦·文言傳》中「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這句話，本是用以解釋乾卦九四「或躍在淵，无咎」的爻辭，陶淵明却將之形塑成儒者之學養襟抱，概括出孔、孟以來儒者的人格理想與價值追求，因而也成為檢驗真儒的最佳尺度。從這個尺度來檢驗陶淵明，則沈德潛把陶淵明許為聖門弟子並無誤判，儘管他說陶詩專門徵引《論語》的話是言過其實的自由心證。然而將陶淵明視為真儒，南宋真德秀已露端倪，他在〈跋黃瀛甫擬陶詩〉中說道：「予聞近世之評詩者曰：『淵明之辭甚高，而其旨出於莊、老……』以

⁷ 南朝梁·蕭統：〈陶淵明集序〉，俞紹初：《昭明太子集校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頁200。

予觀之，淵明之學，正自經術中來，故形之於詩，有不可掩。〈榮木〉之憂，逝川之歎也；〈貧士〉之詠，簞瓢之樂也……雖其遺寵辱，一得喪，真有曠達之風；細玩其詞，時亦悲涼感慨，非無意世事者。」⁸自從鍾嶸《詩品》評陶淵明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以來，後代學者多以陶詩旨出於莊、老，真西山看出淵明之學源於經術，可謂別具慧眼。因為陶詩中不乏悲涼感慨之作，這是不容否認的，如〈述酒〉、〈擬古〉、〈雜詩〉、〈詠荊軻〉、〈詠三良〉、〈讀山海經〉中詠精衛、刑天、夸父等篇，莫不激盪淋漓，感慨悲涼，足見陶淵明「非無意世事者」。清代詩評家頗能兼顧陶詩和暢與憂憤兩面，如潘德輿《養一齋詩話》說：「陶公雖天機和鬯，靜氣流溢，而其中曲折激蕩處，實有憂憤沈鬱，不可一世之慨。」⁹鍾秀《陶靖節記事詩品》亦云：「陶靖節胸次闊大……故憂國樂天，並行不悖。」¹⁰又云：「秀謂知有身而不知有世者，僻隱之流也，其樂也隘；知有我而不知有物者，孤隱之流也，其樂也淺。惟陶公則全一身之樂，未嘗忘一世之憂，如〈飲酒〉第二十是也。晉人放達，非莊即老，獨元亮抗志大聖，寄慨碩儒，於天命民彝之大，世道人心之變，未嘗漠然於懷。」¹¹又云：「陶徵士詣趣高曠，而胸有主宰，平生志在吾道，念切先師，其性定已久。故有時慨想羲皇，而非狃於羲皇；寄託仙釋，而非惑於仙釋。」¹²鍾秀將陶公定性為「志在吾道，念切先師」的儒者，認為大聖碩儒的襟抱才是陶公胸中的主宰，不因有時慨想羲皇、寄託仙釋而變易，可謂知言。陶淵明遊好於六經最大的心得收穫，當在於儒者襟抱之奠定與充實，形成他憂國樂天並行不悖的詩歌特質。

⁸ 轉引自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等編：《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104。

⁹ 郭紹虞編選、富壽蓀校點：《清詩話續編》下冊(臺北：木鐸出版社，1983年)，頁2152。

¹⁰ 同注8，頁240。

¹¹ 同注8，頁243。

¹² 同注8，頁241。

(二) 陶淵明與史書

陶淵明對於史書閱讀之廣博，學養之深厚，似乎尚未引起研究者足夠的重視。陶集中的詩文，頗好引書用典暫且不論，單以古人為題的詩文，已不勝枚舉。如詠三良、荊軻、二疏的三首詠史詩，詠榮啓期、原憲、黔婁、袁安、張仲蔚、黃子廉等人的七首〈詠貧士〉詩，評述《史記》中伯夷、叔齊、箕子、管仲、鮑叔牙、程嬰、公孫杵臼、孔門七十二弟子、屈原、賈誼、韓非、魯二儒、張長公等人的〈讀史述九章〉，詠贊荷蓑丈人、長沮、桀溺、於陵仲子、張摯、邴曼容、鄭次都、薛孟嘗、周陽珪等隱者的〈扇上畫贊〉。此外，〈五孝傳〉中傳贊天子之孝的有虞舜、夏禹、殷高宗、周文王四人；傳贊諸侯之孝的有周公旦、魯孝公、河間惠王三人；傳贊卿大夫之孝的有孔子、孟莊子、穎孝叔三人；傳贊士之孝的有高柴、樂正子春、孔奮、黃香四人；傳贊庶人之孝的有江革、廉範、汝郁、殷陶四人。《四八目》(又稱《聖賢群輔錄》)更是網羅古今約四百名的歷史人物，標出品目逐一條列，上起「燧人四佐」、「伏羲六佐」、「黃帝七輔」，下至兩晉之世的「河東八裴」、「琅邪八王」以及各有五世盛德之稱的「太原王」與「京兆杜」。各條品目之中，或僅列出姓名，如「四凶」這條品目，僅列出「讙兜、共工、鯀、三苗」四人姓名；或將品目中人物的功能稍作說明，如「黃帝七輔」品目中，列出七人的不同職責：「風后受金法。天老受天籙。五聖受道級。知命受糾俗。窺紀受變復。地典受州絡。力墨受準斥」；或列出品目中人物姓名後，又略加考辯。如「舜七友」的品目中，列出「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虛、靈甫」七人姓名後，有云：「右舜七友，並為歷山雷澤之游。」《戰國策》顏歆云：「堯有九佐，舜有七友。」而《尸子》只載雄陶等六人，不載靈甫。皇甫士安作《逸士傳》云：「視其友則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虛、靈甫之徒，是為七子。」與《戰國策》相應。又有將同一品目的人物加以總的品狀者，如列出「蒼舒、隕顛、禱戴、大臨、彪降、庭堅、仲容、叔達」八人之後加以品狀：「右高陽氏才子八人：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凱。」列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鯉」八人姓名之後，亦有品狀：「右高辛氏才子八人：忠肅

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而每一則品目，均載明原書出處，如從「四凶」至「八元」，是「悉見《左傳》季文子辭」；從「燧人四佐」至「黃帝四輔」，是「見《論語摘輔象》」。《四八目》曾被《四庫提要》斷為偽作，但自潘重規先生於 1964 年發表〈聖賢群輔錄真偽辨〉這篇宏文，力辨清人舉為偽作者皆不足據，論證「四八目是陶公所作甚明。這是後人既不必偽作，也是後人所不能偽做的。」¹³ 潘氏又撰〈聖賢群輔錄新箋〉，¹⁴ 袁行霈先生以為其「考辨入情入理，可謂定論矣。」¹⁵ 《四八目》中所徵引的史書性質的著作甚為廣博，計有《史記》、《漢書》、司馬彪《續漢書》、張璠《後漢記》、干寶《晉紀》、張勃《吳錄》、孔術《春秋後語》、趙岐《三輔決錄》、周斐《汝南先賢傳》、嵇康《高士傳》、袁宏、戴逵《竹林七賢傳》，魏明帝《二十四賢甄表狀》，以及不知撰人的《濟北英賢傳》、《京兆舊事》、《三君八俊錄》、《周氏譜》、《荀氏譜》，再加上既是經書亦是史書的《尚書》、《春秋》、《左傳》等等，由此可見陶公史籍涉獵之深廣。如此《四八目》的性質，或許不必如潘氏所謂的只是陶公「上友古人，讀書札錄的成績」，而可能是一部以人物品目為綱，以時代先後為緯的一部通史綱目，它上起三皇時代的燧人氏四佐、伏羲氏六佐，下至東晉的琅邪八王、河東八裴、太原五王、京兆五杜。這當是別出心裁的一部通史間架：不以帝王諸侯為核心，而是以輔佐大臣為主脈。在《四八目》之末尾，陶淵明跋云：「凡書籍所載及故志所傳，善惡聞於世者，蓋盡於此矣。漢稱田叔、孟舒等十人，及田橫二客、魯二儒，史並失其名。夫操行之難，而姓名翳然，所以撫卷長歎，不能已已者也！」由此可見陶淵明搜求之廣，罕有遺漏，不但包括史書在內的一切書籍所載的「善惡聞於世」的知名人物，而且還包括故老所傳的尚未記錄於文獻的知名人物，像「中朝八達」、「河東八裴」、「琅邪八王」以及各有五世盛德的「太原王」及「京兆杜」共數十位近世的知名人物。陶淵明如此周密地搜

¹³ 潘重規：〈聖賢群輔錄真偽辨〉，《大陸雜誌》第十九卷，第十、十一期合刊(臺北：大陸雜誌出版社，1964年)，頁422。

¹⁴ 潘重規：〈聖賢群輔錄新箋〉，香港《新亞書院學術年刊》第七期，頁305-331。

¹⁵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頁600。

掘，嚴謹地擇汰，一部以人物品目為綱、以輔佐大臣為主脈的使人耳目一新的通史輪廓，已經呼之欲出了。可惜陶淵明並未加以記敘鋪陳，以致這部新史徒有骨架而未具血肉。雖然如此，我們從陶淵明對於魯二儒，田橫兩客，以及自動隨趙王敖入獄的十位郎中(除田叔、孟舒外)的八位，皆操行卓犖卻姓名不傳，而為之長歎不已中，便不難嗅出這部通史的一股新氣息：陶淵明對於歷史人物的是非褒貶，操行所占的分量當不在事功之下。只尚事功而不尚操行的價值觀，陶淵明是不以為然的。在〈感士不遇賦·序〉中，陶淵明對世人尚功而不尚行深表不滿。〈序〉云：「悲夫！寓形百年，而瞬息已盡；立行之難，而一城莫賞。此古人之所以染翰慷慨，屢伸而不能已者也。」棄官之後以躬耕守拙、固窮養真的陶淵明，最能體會「立行之難」。但自古以來未聞有一城之賞，封給立行者。凡所封賞，盡是有功於帝王的人。一旦有功於帝王與有益於天下蒼生二者適相舐牾，則僅以帝王家的利害作為賞罰的標準，如何能使是非褒貶不生錯亂？是以陶淵明重操行勝於事功的價值觀，必然會使他所欲論述的通史，不同於當時人的視野。朱熹曾比較陶淵明與當時的名流，說道：「晉、宋人物，雖曰尚清高，然個個要官職，這邊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貨。陶淵明真箇能不要，此所以高於晉、宋人物。」¹⁶ 辛棄疾也在一首〈鷓鴣天〉詞中，將陶淵明與王、謝諸人相比較，說道：「晚歲躬耕不怨貧，隻雞斗酒聚比鄰……千載後，百篇存，更無一字不清真。若教王謝諸郎在，未抵柴桑陌上塵。」¹⁷ 陶淵明之所以能超出晉、宋諸名流的視野，當得力於他對史籍的博覽及史學修養的深厚。由於史學修養深厚，才能培育出貫穿古今的胸襟視野，而不為一時一地的流俗好尚所拘限；才能淬鍊出獨立的思考與判斷，不因眾口鑠金、積非成是而轉移。

¹⁶ 《諸本評陶彙集》，頁1，引自清·陶澍集註：《靖節先生集》(臺北：華正書局，1975年)。

¹⁷ 宋·辛棄疾著、鄧廣銘箋注：《稼軒詞編年箋注》(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5年)，卷四，頁476。

三、何謂「甚解」

何謂「甚解」？前人多以漢儒溺於章句訓詁、碎義逃難、失却本旨為「甚解」，當無異議。陶淵明對漢儒既有所肯定，又覺得有所不足。方宗誠的《陶詩真詮》，所評即能兼顧兩面，有云：「淵明詩曰：『區區諸老翁，為事誠殷勤。』蓋深嘉漢儒之抱殘守缺及章句訓詁之有功於六經也。然又曰：『好讀書，不求甚解。』蓋又嫌漢儒章句訓詁之多穿鑿附會，失孔子之旨也。是真持平之論。」¹⁸ 漢儒於秦火之後，搜求亡逸，校補殘缺，並為之章句訓詁，使人能通曉經書之大體，這是不可磨滅的貢獻。後來利祿之門大開，師法之習已成，學者遂不顧孔子「多聞闕疑」(《論語·為政》)之戒，「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¹⁹ 班固一針見血地指出漢代學者陷溺於章句以自蔽的大患，後代學者難道就不會有其他形態的大患嗎？

溺於章句訓詁之外，以個別詩歌意象來與歷史、時事擅作比附，這也是不少人談到的一種「甚解」。如四言詩〈停雲〉首章四句云：「靄靄停雲，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元·劉履《選詩補注》便謂「停雲」、「時雨」的意象，「以喻宋武陰凝之盛，而微澤及物」；又謂「表昏」、「路阻」的意象，「以喻天下皆屬於宋，而晉臣無可仕之道矣。」並謂此詩「蓋元熙禪革之後，而靖節之親友，或有歷仕於宋者，故特思而賦詩，且以寓規諷之意焉。」²⁰ 明·黃文煥《陶詩析義》則認為「八表同昏，平路伊阻」說的是「日月山河，交失其恆。此復何等景象，可乏同心亟商匡扶哉！」²¹ 二人皆以詩中意象作為政治形勢的隱喻，但同中似有小異，劉氏認為所隱喻的政治情勢是劉裕禪革已成，君臣已經易位；黃氏則認為君勢已岌岌可危，但君臣尚未

¹⁸ 同注 8，下冊，頁 366。

¹⁹ 漢·班固著、楊家駱主編：《漢書·藝文志》(臺北：鼎文書局，1974年)，頁 1732。

²⁰ 同注 8，頁 1。

²¹ 同注 8，頁 2。

易位，故急需尋覓同心親友共商扶救匡復之策。然而兩人皆以詩中的局部意象而與當時政局產生聯想，能無「求甚解」之虞？清·吳菘《論陶》便不能認同上述的聯想，說道：「〈停雲〉、〈時運〉、〈榮木〉三篇，人指為悲憤之作……但前二篇神閒氣靜，頗自怡悅，絕無悲憤之意。即曰憾曰慨(案：〈停雲〉詩有「豈無他人？念子實多。願言不獲，抱恨如何」云云，〈時運〉詩有「斯晨斯夕，言息其廬。花藥分列，林竹翳如。清琴橫床，濁酒半壺。黃唐莫逮，慨獨在余」云云)亦不過思友春遊，即事興懷耳。如指為『求同心』、『商匡扶』，殊屬枝節。」²² 清·吳瞻泰《陶詩彙注》也不以上述聯想為然，他說：「尊晉黜宋，固淵明一生大節，然為詩詎必乃爾！如少陵忠君愛國，只〈北征〉、〈哀王孫〉、〈七歌〉、〈秋興〉等篇正說此意，其餘豈盡貼明皇、貴妃、安祿山耶？〈停雲〉四章只思親友同飲不可得，託以起興，正如老杜「騎馬到階除」，待友不至之意。」²³ 吳菘、吳瞻泰二人之所以均不能苟同〈停雲〉詩為悲憤之作，在於前者能掌握此詩的整體情境乃「神閒氣靜，頗自怡悅」。該詩之〈序〉既總括「罇湛新醪，園列初榮」的酒熟花開之喜，〈詩〉中又分寫「東園之樹，枝條載榮，競用新好，以招余情」的花開人喜，與「翩翩飛鳥，息我庭柯，斂翮閒止，好聲相和」的鳥歌人喜。在此「神閒氣靜，頗自怡悅」的情境之中，「悲憤」之意何從而生？縱有「願言不從」的「歎息」、「抱恨」，乃由於親友為春雨久下不停所阻，道路積水難行，不能前來共飲暢談，不免有些遺憾罷了。此與「悲憤」相去何其懸遠！由此可見將詩中部分意象孤立起來，不顧整體，而自由發揮想像，是很容易落入「甚解」的泥淖的。後者則警惕到自南宋以後，詩評家所賦予的陶淵明的忠憤形象，已漸被標籤化，定型化。就像杜甫被形塑為忠君愛國一樣。杜詩中當然有不少整首都是憂時念亂、忠君愛國之作，但不能每一首都貼上這樣的標籤，陶詩又何嘗不然？因此將詩人標籤化，定型化，就像戴上有色眼鏡觀物一般，使物皆著同一色彩，而背離真實。

²² 同注 8，頁 4。

²³ 同注 8，頁 4-5。

除了溺於章句訓詁、孤立詩歌意象與史事擅加比附之外，是否還有其他形態可能被疑為「甚解」的呢？試以朱自清〈陶詩的深度〉一文為例。

朱自清在〈陶詩的深度〉一文中，認為陶詩的主要思想是道家，其論證之一，便是依據古直《陶靖節詩箋定本》中所注明的用典出處，陶詩引《莊子》與《列子》共七十次，超過引《論語》三十七次的一倍多，這在前面第一節中已言及。其論證之二，是舉〈飲酒〉詩第二十首「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首四句為據，認為詩句中的「真」與「淳」都不見於《論語》。「真」見於《莊子·漁父篇》：「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淳」見於《老子·五十八章》：「其政悶悶，其民淳淳。」王弼注：「其民無所爭競，寬大淳淳，故曰『其民淳淳』也。」因而認為「『真』和『淳』都是道家的觀念，而淵明却將『復真』『還淳』的使命加在孔子身上；此所謂孔子學說的道家化，正是當時的趨勢。所以陶詩裡主要思想還是道家。²⁴ 朱自清這兩個論證，前者只顧徵引某家典籍次數之多寡，而不問該典籍的思想內容是否內化為人格理想及價值追求，很難不被列為「甚解」之一種。至於後者，陶淵明將孔子一生的努力簡括為「彌縫使其淳」。如何便是孔子學說的道家化？雖然「真」字、「淳」字不見於《論語》，而見於《莊子》、《老子》，但「真」和「淳」的觀念，難道便是道家的專利？「真」的反面是「偽」，「淳樸」的反面是「巧飾」，兩相對反的觀念互相依存，不能單獨存在。孔子既反對鄉愿的虛偽，便同時肯定了做人需真誠；既說「巧言令色，鮮矣仁」（《論語·學而篇》）自然肯定了「剛毅木訥，近仁」（《論語·子路篇》）。因此，「真」與「淳」的字面雖未見於《論語》，但「真」與「淳」的價值觀與儒家並無舐觸，雖然儒家更側重於仁義禮樂的人文化成。朱氏只從文字符號的表象便作出過度的推論，亦難保不為「甚解」有再添一例之虞。

²⁴ 同注 3，頁 569。

四、「會意」舉隅

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每當有所「會意」，便喜悅到忘記吃飯的地步。這令人想起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論語·述而》)的經驗。讀書而有所會意，其中包含三個層面：一是讀者所會之意；二是作品所載之意；三是作者所蘊之意。其中讀者所會之意占很重的分量。在閱讀行為中，讀者是主體，不同的讀者由於學養、經歷、視角、方法的差異，對作品所載之意的解讀便有深淺廣狹之別。而作品所載之意與作者所蘊之意二者並非均處於水乳交融，其間的分合消長，亦需讀者據其學養經驗加以辨識判斷。如〈五柳先生傳〉開頭數句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此數句字面之意至為明白，但作者所蘊之意卻在字句之外，需由其他途徑方可窺知，故孟子既要人「以意逆志」，復教人「知人論世」。「以意逆志」就是「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²⁵「知人論世」就是「論其當世行事之跡也。言既觀其言，則不可以不知其為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²⁶是以欲知此數句中作者所蘊之意，便需考察陶淵明的「當世行事之跡」。錢鍾書對「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氏(氏當作字)」二字有精闢的解讀：「豈作自傳而並不曉己之姓名籍貫哉？正激於世之賣名聲、誇門地者而破除之爾。」²⁷東晉是門閥政治盛行的時代，甲族子弟弱冠而仕，便平流進取，坐致公卿。政治上既享特權，經濟上亦復如是，山林湖泊之地，一旦相中，便可上書朝廷請求賞賜(如謝靈運於宋文帝元嘉中先後要求賜給會稽東郭的回踵湖及始寧的甬湖，以便決湖為田。宋文帝已令州郡履行，而為會稽太守孟顛所阻。)由於高門大族備受禮遇，「賣名聲，誇門地」之風自然大行其道。陶淵明對自己出自陶唐氏的家族極為熱愛，在〈命子詩〉中對歷代知名的祖先無不頌揚，尤其對勳德雙全的曾祖父長沙公陶侃，更是讚美備至。陶侃救平蘇峻之亂，使朝廷轉危為安，身兼荆、江二州刺史，都督八州諸軍事，

²⁵ 《孟子·萬章上》，宋·朱熹：《四書集注》(臺北：大安出版社，2008年)，頁429。

²⁶ 《孟子·萬章下》，同上書，頁453。

²⁷ 錢鍾書：《管錘篇》第四冊(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1228-1229。

據上游，握強兵，雖功高可以震主，而無覬覦之志，犯上之行，比起高門大族中的王敦以及桓溫、桓玄父子，相去何其懸殊！然而為自己的家族感到自豪是一回事，誇耀門第坐享特權是另一回事。陶淵明既具儒者的襟抱，有「大濟蒼生」的壯志宏願，但在仕途上奔走十年之後，既知時不可為，便激流勇退，放下身段，以躬耕務農終其一生。選擇過心安理得的「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的陶淵明，一旦與「朝遊金張館，暮宿許史廬」的傲慢自大、不可一世的高門大族相對比，後者靈魂的齷齪不堪便難以遁形。再高的門第，再顯的郡望，陶淵明何嘗放在眼裡？因此「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二句，在錢先生的解讀之外，我們還感覺到這兩句語調的舒徐不迫，語氣的輕淡平和，但輕淡中似乎帶一點冷峻，平和中似乎帶一點詼諧，陶淵明以「不知」、「不詳」兩個否定句，似乎對門第郡望作出委婉的揶揄嘲諷，令人想起左思八首〈詠史詩〉對門閥制度的控訴，但左思似乎用了千鈞之力，而陶淵明僅僅用了四兩，其散文藝術的高妙，實在令人讚歎。

因此，當讀者之意與作品、作者之意相融貫，這便是一種會意。像上述錢先生對〈五柳先生傳〉的解讀，便是有所會意的解讀。然而某些著作，並不具備一個獨立的原始作者，例如《左傳》、《國語》、《史記》等史書，是由史家蒐集史料，分門別類，然後加以意匠經營，方能有成，因為史料與史料之間，往往出現斷層或空隙，需由史家加以推想填補。是以無論是史料的新、舊記錄，無論是史家對斷層或空隙的推想填補，其中都有尚可斟酌的空間，尤其是史書中許多事件的細節部分，會使讀者產生不同的推想和填補。譬如秦穆公以三良殉葬，是千真萬確的史實。但是整個事件過程的細節以及關係人物的心理，都會留給讀者一些想像的餘地。在〈詠三良〉詩中，陶淵明將君臣遇合的想像——肝膽相照、生死與共——填入秦穆公與三良之間的留白，並以「臨穴罔惟疑，投義志攸希」一幅從容鎮靜的赴義神情，顛覆了自《詩經·秦風·黃鳥》詩以來「臨其穴，惴惴其慄」這個恐懼戰慄的舊有想像。

當獨立的原始作者不存在，史家充其量只是個編撰者。在原始作者形同缺席之下，前面所說的作者所蘊之意，既難以考究，這時面對文本所載之意，

則讀者會意的空間便因而大增。因此陶淵明的詠史詩及詠神話題材的〈讀山海經〉詩，其中所會之意，常令人驚異。〈詠三良〉這首詠史詩已見前述，〈讀山海經〉詩所歌詠的夸父、精衛、刑天諸神亦復如此。夸父追日的神話，是說夸父雖然追上了太陽，但渴死於路上，整條黃河、渭河的水都救不了他。因此《大荒北經》所載的「夸父不量力，欲逐日景」之說，或許是眾多讀者的共同反應。但陶淵明不以爲然，而把《海外北經》所載「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爲鄧林」作特殊的解讀，認爲夸父追日，雖敗於生前，但成於身後，所謂「餘迹寄鄧林，功竟在身後。」明·黃文煥在《陶詩析義》中，對陶淵明這個令人驚異的「會意」，再加以發揮，認爲這首詩「寓意甚遠大，天下忠臣義士，及身之時，事或有所不能濟，而其志、其功足留萬古者，皆夸父之類，非俗人目論所能知也。胸中饒有幽憤。」²⁸ 黃氏把不自量力的夸父脫胎換骨，使之成爲留名萬古的忠臣義士的象徵，便是受到陶淵明的「會意」所啓發的。至於女娃遊於東海被溺而化爲精衛鳥，刑天(舊本作形夭)與帝爭神而被斷首這兩則神話，陶淵明既悲其良辰不待，又壯其猛志常在。悲其良辰不待，當是一般人的反應；而壯其猛志常在，則屬陶公特殊的「會意」。黃文煥對此又作出精彩的發揮：「被溺而化爲飛鳥，仍思填海；被斷而化爲無首，仍思爭舞；是謂化去不悔。海未必可填，舞未足終勝。死後無裨生前，虛願難當實事。時與志相違，是謂『昔心徒設』、『良辰難待』……志士之爲精衛、刑天者，何可勝歎！懦夫之不知有精衛、刑天者，何可勝嗤！」²⁹ 由於陶淵明獨特的「會意」，經由黃文煥精彩的發揮，使精衛和刑天都成了空有宏願而時不我與的志士的象徵。

陶淵明除了讀書善於「會意」，還對大自然善於「會意」，因而留下不少佳句名篇。如「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眾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讀山海經〉其一)、「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飲酒〉其五)、「弱

²⁸ 同注 8，頁 301。

²⁹ 同注 8，頁 302。

湍馳文鯉，閒谷矯鳴鷗」(〈遊斜川〉)、「鳥嘒歡新節，冷風送餘善」(〈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其一)、「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其二)、「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露凝無游氛，天高肅景澈。陵岑聳逸峯，遙瞻皆奇絕。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巖列。懷此貞秀姿，卓爲霜下傑。」(〈和郭主簿〉其二)、「青松在東園，眾草沒其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連林人不覺，獨樹眾乃奇。」(〈飲酒〉其八)等等。這些詩句都成爲一般人接觸陶詩時最爲引人入勝之處。

五、結語

本文認爲，陶淵明好讀之書，主要是經書和史書。陶淵明將經書內化爲其人格理想及價值追求，而培養出儒者的襟抱，奠定了「進德修業，欲以及時」的人生方向。爲此，陶淵明從而立之年起，在仕途中奔走十餘年，希望能及時爲人所知，爲世所用，尋得知音，共同爲「大濟蒼生」而努力。結果却知音難覓，時不可爲。既然孤掌難鳴，而形勢險惡，乃毅然辭官，以躬耕固窮終其一生。陶淵明的躬耕，與長沮、桀溺的耦耕，卻貌同心異。長沮、桀溺耦耕以避世，對世道人心已經絕望。陶淵明仍結廬人境，不避車馬，但不爲車馬喧嘩所擾；既可與農人共話桑麻，又能與文友賞文析疑，飲酒賦詩。步入晚年之後，孔子的典範仍然活在心中，故能從文化史的宏觀視野，對孔子作出「彌縫使其淳」、「禮樂暫得新」的崇高評價，並對時人之不親六經而追逐清談，不爲蒼生而爲門第，而抒發其憤慨。黃文煥《陶詩析義》評「彌縫」二字云：「『彌縫』二字，道盡孔子苦心。決裂多端，補綻費手。」³⁰可謂一針見血。清·溫汝能《陶詩彙評》則說：「淵明〈飲酒〉詩，讀至末章具見本領。『彌』，補也；『縫』，合也；二字固盡聖人參贊之妙。然予謂著眼尤在一『使』字。非孔子無彌縫手段；非孔子不能使淳。『使』字有無限功用在。淵明爲聖賢中人，故能道之親切有味乃爾。」³¹可謂鞭辟入裡。至於

³⁰ 同注 8，頁 197。

³¹ 同注 8，頁 199。

「禮樂暫得新」，是說春秋時諸侯之間常有聘使往來，行禮奏樂，卻不知禮樂的精神本質，只是徒具形式。因此孔子大聲疾呼：「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論語·陽貨》)又深深慨嘆道：「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孔子重視禮樂的精神本質，將異化變質的禮樂重新植根於仁愛的土壤之中，終使禮樂精神為之一振，使人心受到潛移默化。這是孔子對文化精神莫大的貢獻。晚年的陶淵明對孔子作出如此深刻的解讀，這說明陶淵明不僅對典籍、對大自然善於「會意」，對評論人物也極具「會意」的智慧。

陶淵明從史書中得到的最大收穫，應該是開拓出貫通古今的恢弘視野，淬鍊出思考判斷的獨立精神。而恢弘的視野與獨立的精神，會層層堆積出文化的沃土，讓生長在上面的智慧之樹，頻頻結出「會意」的碩果。

重「會意」而「不求甚解」，是陶淵明啓示後人的重要讀書要領。「甚解」的型態雖然層出不窮，但不論是碎義逃難的章句訓詁，或是孤立意象去比附史事的穿鑿附會，或是視數目統計的量化為客觀，或是拘執於字面符號，而不能穿越表象，深入意境：這些不同的形態卻有共同的交集，那就是見樹而不見林；重枝節而不顧枝幹；好剖析而不善會通。重會意恰好相反：既見林亦見樹；既重根幹亦不忽枝節；既重會通亦知剖析。陶淵明重會意的讀書秘訣，是從他深厚的經史素養中自然形成的。有深厚經史素養的人能從「會意」中得到「欣然忘食」的喜悅，自然就「不求甚解」了。

放眼當今臺灣的中文學界，經、史分了家，中文、歷史分成兩個系，而開在中文系的經書與開在歷史系的史書，都不很齊全。中文系雖也開一兩門史書點綴，如《史記》、《漢書》，但比起開在中文系的子書之多，不可同日而語。在中文系課程結構上，子部、集部的課蔚然大盛，經部、史部的課有日益蕭條之勢。不但在課程結構上如此，學者的研究方向亦復如此。長此以往，我們的中文學界由於對經史的忽略，會不會變成不知「會意」為何物，而唯「甚解」是求呢？我們是否正在走向與陶淵明重「會意」相反的路上呢？希望這只是杞人憂天。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古籍

- 漢·班固著、楊家駱主編，《漢書·藝文志》，臺北，鼎文書局，1974。
- 南朝梁·蕭統，〈陶淵明集序〉，俞紹初校注，《昭明太子集校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
- 宋·朱熹，《四書集注》，臺北：大安出版社，2008。
- 宋·辛棄疾著、鄧廣銘箋注，《稼軒詞編年箋注》，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5。
- 清·沈德潛，《古詩源》，臺北：華正書局，1983。
- 清·陶澍集註，《靖節先生集》，臺北：華正書局，1975。

中文部分—論著

- 于光華 (1981)，《評注昭明文選》，臺北：學海出版社。
- 古直 (1964)，《陶靖節詩箋》，臺北：廣文書局。
- 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 (2004)，《陶淵明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
- 朱自清 (1982)，《陶詩的深度——評古直〈陶靖節詩箋定本〉(層冰堂五種之三)》，《朱自清古典文學論文集》，臺北：源流出版社。
- 袁行霈 (2003)，《陶淵明集箋注》，北京：中華書局。
- 郭紹虞編選、富壽蓀校點 (1983)，《清詩話續編》下冊，臺北：木鐸出版社。
- 潘重規 (1964)，〈聖賢群輔錄真偽辨〉，《大陸雜誌》，19(10、11)，頁 419-422。
- 潘重規，〈聖賢群輔錄新箋〉，《新亞書院學術年刊》，7，頁 305-331。
- 齊益壽 (2002)，〈陶淵明〈飲酒〉詩三問〉，《魏晉南北朝文學與文化論文集》，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
- 錢鍾書 (1982)，《管錐篇》，第四冊，北京：中華書局。

An Analytic Study on Tao Yuan-Ming-- Delight in Study but Do Not Seek Abstruse Explanations

I-Shou Chi *

Abstract

It is well known that Tao Yuan-Ming claimed himself to “delight in study but do not seek abstruse explanations.” However, there are few researches on which books he studied, what kind of comprehension he had from the books, and how he internalized the comprehension.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ao was fond of reading Confucian classics and historical books. From the comprehension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Tao internalized it to form his ideal personality and values. Furthermore, Tao read most of the historical books and scripts he could collect and wrote “The Records of the Ministers of Sages,” an outline of general history. In addition, the paper will analyze and sort out the kinds of “abstruse explanations” Tao did not pursue explanation to the utmost. Conversely, he put much emphasis on comprehension. In the process of studying the Confucian classics and the historical books, Tao refined his reading method to comprehend the meaning of the books. Whenever he apprehended the meaning, in his happiness he forgot to eat. Therefore, it is reasonable that he did not seek abstruse explanations.

Keywords: Tao Yuan-Ming, “Delight in Study”, “Abstruse Explanation”, “Comprehension of the Meaning”, “Forget to Eat in Happiness”

* Professor of Chinese Literature, Chair of the Chinese Literature Department, NTU. Adjunct Professor. Visiting Scholar, Cambridge University, UK. Senior Lecturer,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mail: ishou.chi@msa.hinet.net